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宋代文学思想史 (修订本)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oughts
in Song Dynasties . revised edition*

张 毅 著

中华书局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宋代文学思想史

张毅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学思想史/张毅著. —北京:中华书局,1995
(2006重印)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ISBN 7-101-01222-1

I. 宋… II. 张… III. 文学史-中国-宋代
IV. I209.44

书 名 宋代文学思想史(修订本)
丛 书 名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著 者 张 毅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1995年4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北京第2版
2006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 18½ 插页 2 字数 259千字
印 数 7001—11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1222-1/I·195
定 价 34.00元

序

罗宗强

一

极简略地说,文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体裁的探索、风格韵味情趣的追求等等)?应该如何构成这个面貌(方法与技巧的选择、修辞与声律的运用等等)?它的承传关系是什么(应该接受哪些和摒弃或者改造哪些传统,文学传统上的是是非非等等)?它应该如何发展?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种种看法,都属于文学思想史所要研究的范围。

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个人的文学思想,而且要研究文学思想潮流。有时候,一种文学思想倾向成为一股不可阻拦的力量,推动着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的。建安时期以文学抒泄个人情怀,追求风骨,成为一时风尚;梁、陈的宫体诗风;明代诗坛的复古风尚,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热,都是人所共知的例子。在这些形成一时风尚的创作倾向背后,是什么样的共同的文学思想支配着,正是文学思想史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

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左右一代的文学思想潮流,而且还要研究不同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在文学发展的初期,文学思想的发展趋向较为单一,而越到后来,便越向多元发展,在同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里,产生着不同流派的文学思想。这同样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例如,同是中唐,就有基本倾向完全不同的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这两个诗派,在看待文学的特质、功能上,在审美情趣的好尚上,在技巧的追求上,都是完全相左

的。何以产生这类现象,应该给予怎样的解释与评价,这正是文学思想史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思想的地域色彩问题。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有过这样的现象:出生于同一个地域或者活动于同一个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创作倾向上相近或相似,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文学思想史也必须作出回答。

二

文学思想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点,我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前言中已经提及,这里还想稍加阐述。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之初,研究对象似未曾有过明确之界定。它既包括文学批评史,也包括文学理论史。就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历史状况而言,这样的研究对象的认定未曾不可。因为在中国古代,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少数,多数的文学理论著作,都包含着文学批评,即使体大思精,有完整理论体系如《文心雕龙》,也不例外地包含着大量的文学批评内容,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对于文的历史(作品与作者)作评论的基础上,建立它的理论体系的。《文心雕龙》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它的文学理论著作了。当然,不涉及文学批评的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不是没有,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但是,这类著作毕竟只是少数。

因此,从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此种历史状况而言,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而言之,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这一学科的定名上。名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它应该只研究文学批评的历史,而中国的文学批评既与文学理论纠缠在一起,那么它自然而然应该按照它的历史实际给予命名,名之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样的命名,在理论研究上可能会较少疏漏,而使这一学科在理论上更趋于严密与成熟。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显然比文学理论批评史更为广泛。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反映了文学思想,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中之外,它大量的的是反映在文学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

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为数不少。例如,李商隐的诗文思想。义山诗歌,无疑反映着一种异常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诗歌思想倾向,由于他追求凄美幽约,表现朦胧情思,他对于诗的特质与功能、诗的技巧与趣味,就都有着完全异于他之前对这些问题不同理解。但是,他却几乎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他的文的思想也有相似的表现。在中唐那样大规模的文体变革之后,他却复归于骈体文的创作,而且写得是那样用典圆融、结构谨严、典丽深美。他的骈文创作无疑是对中唐文体变革的一种反弹,但是他同样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我们还可以举出《金瓶梅》的例子。这部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至今还没有为治文学思想史者所充分认识。由于转向写日常生活,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与叙事方法、修辞技巧诸方面,便都有了极其重要的发展。它无疑标志着小说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作者同样也没有理论的明确表述。如果我们忽略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那么我们便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重要方面忽略了,就会写出一部不完整的文学思想史。

更重要的是,由于汉中叶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各个朝代的统治思想,违反了它,个人无论在仕途上还是立身处世上,便都可能遇到麻烦。因此,在公开场合,言行符合于儒家规范,便常常是大多数入仕的士人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对于文的种种言论,同样受着这一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公开的场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是与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究竟哪一种倾向更代表着他的文学观,这就需要将他的言论与他的创作实际加以比对,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们不去考察他的文学创作倾向,而只根据他的言论作出判断,那么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的描述,便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即使只就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本身的解读而言,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实际的考察。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是明显的例子。他们评论了许多作家,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实际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就无法对刘勰与钟嵘的有关评论作出正确的解读,当然也就无法作出是非判断。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离开文学创作实际是无法进行的。把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与文学批评、文学

理论相印证,结合起来研究,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思想史。

三

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是文学创作实际,那么也就提出了一个与文学史相区别的问题。

文学史应如何写,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因之现在来说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区别,也就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不过,我想,最基本的一点还是可以说清楚的,那便是: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思想史则是文学思想的历史。文学史必须描述文学的史的面貌,而文学思想史要描述的,是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由于这一基本着眼点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差别。

同是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本身,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由于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现象本身,因之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当它描述文学现象时,往往较为全面地顾及其时之作家群落,顾及作家创作的各个方面。而文学思想史由于它的着眼点是文学思想,而且是在史的发展中考察文学思想的演变,因之它只注意文学现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学思想倾向的部分,而忽略其余。如果是一个作家,它便只对他的与他的文学思想倾向有关的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而置其余于不顾。如果是一个流派,它只着眼于这一流派各个作家中那些反映出共同倾向的作品,而不去描述一个一个的作家。如果是一种思潮,则它的描述更广阔些,同时也就更加忽略文学创作的更为完整更为多面的情形。要之,同是涉及文学创作,文学史更注重文学创作的全貌,而文学思想史则只注意那些反映出文学思想共同倾向的部分。

即使涉及同样的作品,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的着眼点也往往是不同的。文学史分析的是作品本身,而文学思想史则是通过作品追寻其文学思想,它是属于更为内在的层次。与此有关,文学史往往较为详细地介绍作者的生平遭际(对大作家尤其如此),以便更为全面与深刻地分析他的作品。而文学思想史则极少这样做,除非他生平的某一重要经历对于他文学思想的转变有重大影响。

当然,更为主要的区别,是文学思想史不仅涉及创作实际,而且大量涉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而这两个方面,在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里,是被忽略或者是被放在次要地位上的。而从总体风貌上看,文学思想史较之文学史,必然更富思辨色彩,更具理论素质。

当然,由于二者均涉及文学现象,相同与相近有时也在所难免,但是,

大的方面,它们的区别应当说相当明显,不易混同。如果一部文学思想史写出来让人感到它是一部文学史,那便是它的失败。因为至少说,它的作者缺乏理论的素养,缺乏思辨的能力,当然,也缺乏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抽象的总体把握的能力。

四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以为,不论用何种的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

今人看古人,由于观念与思维方法的差异,由于史料的种种限制(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的种种局限),要完全地了解,准确地认识,是极难的。今人眼中的古人,不可避免地常常附着上今人的印记。研究古人的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着今人文学观念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完全地恢复古代文学思想的原貌,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任意地附会古人,装扮古人,把古代文学思想现代化。如果说,在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什么大忌的话,那么,我以为,把古代文学思想现代化就是大忌。把古代文学思想现代化,结果一定会把古代文学思想史弄得面目全非,从而完全失去它“史”的价值。

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作出评价,论略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

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两部分来说,历史还原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原文的正确解读。原文的解读当然有一个训诂的问题,但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又不仅仅涉及文字训诂。有许多批评范畴,仅看文字训诂是无法正确解读的,如“气”、“风骨”等等,它还有一个理论索原的工作要做。即使那些在文字上看来并不难懂的地方,也往往存在着解读的困难。一种批评与一种理论的出现,有它的具体的环境。它是针对什么说的,它的原意是什么?离开了具体的环境,就无从索解。在当时,有的问题不言而喻,时人都能理解,作者在文字里便省略了。我们今天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便无法对之作出符合于原意的解释。这就涉及到考察历史环境的问题,有时为了一句话,可能要求清理一大段历史。离开了细心的大量的史料的清理与历史面貌的追寻,我们便有可能对看来明白而其实甚为复杂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原文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这个角度说,原文的正确解读不仅仅是文字本身,也包括着更为广阔的

历史事实的清理,复原历史的原貌。

无论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的文学思想,都必须涉及到它们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恢复它们的原貌,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历史条件作出认真的研究。我以为,影响文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一种大的社会思潮,往往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的。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就差不多改变了一代士人的生活风貌。宋明之际的理学也是例子。社会思潮对于文学思想演变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学功能、审美时尚、题材倾向诸方面。一个充满变革思想的变革时期,文学创作自然地带来了变革思想;一个儒学复古的时期,文学中的明道主题就相对多起来。不过,我以为,影响文学思想演变最重要的还是古人心态的变化,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来实现。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心态的变化在文学思想演变中实具关键之意义。

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因素极多,经济、政治、思潮、生活时尚、地域文化环境以至个人的遭际等等,都会很敏锐地反映到心态上来。中国的士人,大多走入仕途,因之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至大。政局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差不多都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回响。在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时,政局变化的影响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我们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外部原因引起士人心态起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何以他们的人生旨趣变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变了,审美情趣变了。当然,影响文学思想变化的,还有其它艺术门类的发展情况,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自然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

历史还原,就是要弄清上述种种因素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广泛、认真、严谨的清理史料的基础上,形成对于历史的一种活生生的体认,设想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状。这样,对于当时文学思想的理解,就会真切得多,可靠得多,真实得多,当然也就会少一些现代的影子,少一些附会。

在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探讨规律,作出是非判断,以论定其价值之高低。

当然,这样做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往往需要通读一个时期的差不多所有存世之作,和作者们的生平材料,才能形成其时文坛风貌的大致轮廓;需要阅读所能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史料,辨别思索,才能对该时期的种种重要事件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是这样的:为了弄清

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往往翻遍存世的能够找到的所有典籍,结果用得上的材料则百不得一,甚至千不得一。

这样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很笨拙,无疑也是很艰辛的,而且朝代距今越近,困难也就越大,盖存世典籍浩如烟海故。

五

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是我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中的一卷。上面说的这些话,是为这套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作一点简略的说明,本该放在《周秦汉文学思想史》的卷首。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后往前写,继我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宋代文学思想史》率先完成,又蒙中华书局扶持后进的一片热情,应允先为出版,就把上面的这些本该置诸第一卷《周秦汉文学思想史》卷首的话,置诸《宋代文学思想史》卷首。将来《周秦汉文学思想史》成书时,我想它的卷首应该有一篇总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变轨迹、特色与价值的前言。

我第一次见张毅,是近八年前他人南开攻读硕士课程的时候,壮实、精明而且敏锐。一次看他的读书笔记,我大吃一惊,那上面不是材料的摘录,而是他读书时的种种见解,电花石火,新见迭出,左右融通,浮想联翩,其中的许多见解,都可以独立写成文章。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敏锐思辨能力的理论型的研究人才。但是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便钻进资料堆里去了。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我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中的一段。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这个题目难度实在太大。有时候我想,我实在有些狠心,压给他这样大的题目。但又想,他那么壮实的身体,恐怕是累不垮的吧!两宋载籍数量极大,他便一部一部读,总集、别集,子、史以至经注,寒来暑往,历时四年,未曾间断。终于从电花石火走向坚实严谨的治学之途。那么大的工作量,他居然没有累垮,还是那么壮实,而且书写得令我非常满意。他是把他赋有的敏锐思辨能力与细心的丰富的资料梳理结合起来了。面对人所共知的宋代文学现象,若没有新的材料与新的视角、新的理解,便可能失之于陈旧;若对资料作全面清理,多所发现而缺乏总体把握的能力,则又可能失之于琐碎。张毅的书,这两个方面都避免了,既给人以新鲜之感,确有自己的理解与发现,也没有琐碎之弊。他是把宋代文学思想的总的风貌给描述出来了。

在这个总体面貌的描述中,既可以看到文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又时有精彩的见解,如关于北宋初期创作心态向内收敛,在创作上追求老境美的有关论述,对苏、黄诗风的比较和对江西诗派诗歌思想,对“辨句法”、“主

活法”、“求高妙”的阐释,对朱熹的心性理论和他的诗歌思想的理解等等,都是相当精彩的。记得有一位青年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近年来学界有一种“著书而不立说”的现象,我以为,这是说得非常中肯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就因为缺乏严谨的学风,缺乏刻苦的治学精神,依靠二手材料,片言只语,胡乱发挥,衡之历史事实,则大相悖违。不是通过认真研究的结论,虽有所说而其实说不能立。我以为,张毅没有受这样的风气的影响,他是走着认真刻苦、严谨治学的路,著书而立说了的。但愿他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还年轻,前路尚远,循此以往,当有所成。

目 录

序(罗宗强)	1
引 言	1
第一章 北宋初期的文学思想	12
第一节 向内收敛的创作心态	14
第二节 道统、文统的重建	23
第三节 追求平淡清远的文学思想倾向	31
第二章 变革时期的文学思想	40
第一节 经世致用思潮	41
第二节 追求雄豪奇峭而归于平淡隽永	54
第三节 兼蓄包容的思想倾向	65
第三章 成熟时期的文学思想(上)	76
第一节 崇尚清旷	77
第二节 追求理趣和老境美	89
第三节 强调学问和功力	102
第四章 成熟时期的文学思想(下)	117
第一节 以“格高”为创作宗旨	119
第二节 诗歌批评中的“辨句法”、“活法”和“悟人”	131
第三节 “以俗为雅”的文学思想	147
第五章“中兴”时期的文学思想	156
第一节 慷慨沉郁、重才重气的创作思想	157
第二节 主活法、重机趣、求高妙,流于工巧清淡	169
第三节 讲求实用的“文法”理论和散文评点	186
第四节 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学思想	193

第六章 南宋后期的文学思想	208
第一节 正统文学思想	210
第二节 “苦吟”与“别材”、“别趣”	217
第三节 对诗词体格法式的重视	229
第四节 小说观念的变革和通俗文艺思潮	241
第五节 写爱国情怀和亡国悲愤	253
结束语：宋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259
一、宋代文学思想的基本走向	259
二、创作个性、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想	262
三、新禅宗和理学的影响	266
四、世俗化文学思潮的崛起	270
后记	274
修订本后记	275
引用书目	277

引 言

一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衰弱动荡时期,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远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比,但在文化建设和学术思想方面,却呈现出承先启后、宏通广博的繁荣景象。中华文化经数千年的演变,至此进入了一个极盛的成熟阶段。论学术,向来是汉学与宋学并称;言传统的诗文创作,诗有“唐音”、“宋调”之争,文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谈书画艺术和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话本戏曲等市民文艺,则宋元同列;作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宋明理学又是一脉相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宋代都是中国封建文化最为发达、覆盖面最广、程度最高的一个时代。宋代文学思想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侧面。

本书的撰写目的:以宋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为背景,从一个时期具体文学创作活动中所形成的共同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入手,总结作家在创作方法、审美情趣、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结合文学理论批评,按照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时间段落,对有宋三百二十年(960—1279)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和演变过程,作整体的把握和全面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揭示宋代文学思想在继往开来的发展过程中所解决的新问题,所开创的新理路,以认识其特点并探讨其规律。

二

宋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唐代文学思想,特别是中晚唐以来的文学思想,有着十分紧密的承接关系,主要体现在对文学特征和文学功用的认识上。

唐朝建立之初,唐太宗及其重臣从政权得失的角度考虑,坚决反对齐、梁的绮艳文风,要求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但他们提倡文质并重,希望能合南北文学之长为一体,没有否定魏晋六朝文学的艺术成就,允许作家继续对文学特征及其艺术表现技巧作进一步的探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出现于文坛后,从文学自身发展的缘情特点中,初步找到了一条扫荡齐、梁绮艳文风的途径。那就是在创作上追求壮大的气势和浓郁的感情,用昂扬向上、积极健康的感情取代艳情,以广阔的胸襟气魄开拓文学发展的新天地,在理论批评方面提倡“兴寄”和“风骨”。与此同时,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完成了齐梁以来诗歌音律形式美的探索,使律诗的体制得以定型。这些作家从思想上和艺术上为盛唐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盛唐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具有“盛唐气象”的诗歌创作体现出来的,它以充满乐观自信的精神、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以清刚壮大的气势,谱写了六朝以来缘情文学最光辉的篇章。它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情思,兴象玲珑、自然天成的诗境,解决了稍后《诗格》、《诗式》等诗论著作对诗歌意境创造的一切理论要求,令人叹为观止。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先是在大历年间出现了追求淡泊情思与淡泊境界的文学思潮,诗人崇尚高情、丽辞、远韵,热心于对艺术形式和技巧进行探讨。继之士人由理想而现实,由彷徨而振作,产生了一种渴望改革以挽救唐王朝衰落的强烈愿望,文学的政教功用受到重视,文学思想也开始了转变,由盛唐的倾向于抒发理想情怀,转折为中唐的更倾向于写实和重功利。文学思想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有贞元到元和年间元、白等人为时为事而作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所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在政治革新无望后半途而废,由讽谕教化转向写个人情思的闲适唱和,作诗尚实、通俗和务尽。有重主观、尚怪奇的韩孟诗派,或以文为诗,以丑怪为美,或啼饥号寒,醉心于苦吟,以至产生李贺那种充满梦幻呓语的“长吉体”诗风,哀感顽艳,奇特无比。到了晚唐,诗歌思想又复归于绮艳,以写个人内心种种具有浓郁痛苦伤感气息的细腻情思为主,追求细美幽约,追求绮丽清艳,追求更能体现诗歌情韵之美的“味外之味”和“象外之象”。

唐代诗歌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反对齐、梁绮艳文风开始,最后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绮艳的回旋过程,贯穿这个过程的主导思想倾向,是对讲求抒情和辞采的文学基本特征的积极肯定和深化。散文思想的发展也是从反对代表绮艳文风的骈体开始,最后又复归于骈体的绮艳,但中间并没有一个走向壮大情思和刚健风骨的阶段,而是直接走向更加实用

的散体,走向“文以明道”说所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唐人对文学功用的认识和强调,主要是在散文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说唐人对“诗”的理解还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的诗的话,那么他们对“文”的看法显然要宽泛得多,它既可以包括诗赋等非实用性的体裁,也包括策论表奏、碑诔志传、笺记书信等许多实用性的文体。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文”总是比“诗”更偏重于实用,唐代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虽然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地是和散文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唐韩、柳等人倡导的“文以明道”的古文创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适应了当时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把文体和文风的改革落到了实处,并非空言明道。可一旦这种现实需要不复存在,也就很难作为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文学思潮继续发展,以致晚唐讲求绮艳的骈体文再度兴起。

北宋初期的七十余年间,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绮艳文风相沿成习,无法根除。这一方面表明文学思想的演变有着自身的延续性,是一个缓慢的转化过程,不会因朝代的更换而立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初作家对文学特征的认识还没有超越前人,还没有形成有自身特点和创新精神的文学思想发展的新观念和新理路。宋初诗坛流行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基本上都处于唐人诗歌的影响之下。诗人倾向于写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情感体验,倾向于酬唱时的讲究修辞和声律,内敛的心态甚为分明。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变化的:一是随着宋代建国之后社会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初步繁荣,作家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有很大提高,建立在人文修养基础上的品格完善精神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诗歌创作已无晚唐以来的衰飒之气,由绮艳向典雅、高逸方面发展,审美趣味趋于平淡清远。二是倾向于用词来抒写深微精美的情思,注意到诗与词所表达的情感层次的不同,言情的重点开始由诗体转到词体,词成为表现作家内心细美幽约的情感体验的文学载体。

宋代文学思想的转变以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为起点,尽管宋初就有一批作家开始提倡古文,力图变革文风,但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绮艳文风直到此时才得到了扫荡。宋诗的变革并不是像唐诗那样,从文学缘情的特点出发,以浓郁的情感和壮大的情思去消除绮艳,而是站在文学应经世致用的立场,采取以文为诗、以气格为诗的方式变革诗风。诗人以气节相高而追求雄奇,济世热情中含有较多的现实批判的理性内容,一开始就带有“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诗风的转变深受当时古文创作思想的影响。宋代的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中唐韩、柳等人“古文”创作思想和探索精神的继续,在对文学功用的认识上,欧阳修等人以韩愈

的“文以明道”说为宗旨,强调文学的政教之用,要求文学承当起道德教化和政治变革的作用。不同的是,唐代古文创作重功利的文学思想还只限于散文,而且没能贯彻下去而被骈文所取代。宋代的古文运动由于有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等人的参加,不仅在文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带来了散文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古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动摇的正宗地位,而且影响到诗的散文化,一些没有多少诗意而应该用文来表达的内容也被写到诗里来。

强调文学政教功利作用的文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唐宋古文家的文学思想都与复兴儒学有关。儒学的真正复兴和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产生是在宋代,所以儒家那种本于经世致用要求的“明道”、“言志”的文学观,能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再度流行开来。但“文以明道”说对文学思想发展的推动是有一定条件的,只有当它切合现实社会政治需要时,才能真正使文学发挥辅时及物的功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否则只能给文学思想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唐、宋古文家的文学思想都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与推崇古文相伴随的宗经复古思潮和以文为诗的现象,使文学重情感和词采的特征受到忽视,许多本来不属于文学的内容包容在“文”的概念里,文学观念又退回到魏晋六朝以前那种文学与经、史不分的泛文学阶段。这种文学“复古”实际上是一种退步。只有克服了儒家复古主张的消极影响,文学思想才能按照自身特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能取得成功,除了“明道”说的发展能与政治改革紧密配合而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外,还在于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优秀作家以各具个性风格的作品体现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要求。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其优秀散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六一风神”,以纾徐委备的语调表现俯仰自得的情感,极大地增强了古文的抒情性而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他作家的古文创作,如曾巩的严谨平实,王安石的拗劲刚健,苏氏父子的汪洋恣肆和雄奇奔放,都具有个性化的艺术风格。这样就使“古文”能将叙事议论与表情写意结合起来,成为描述评说客观现实事物与展示作者个性和内心世界相结合的艺术样式,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同样,这一时期文人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气格”,具有气横意举的情感气势和人格力量,即便是在看似平淡的作品里,也体现了作家性情的沉着和意趣的高远。文学的言情特征以注重发挥作家主体才情和展示个性人格的方式来体现。

如上所言,宋代作家对文学基本特征和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深受晚唐五代文风和中唐古文创作思想的影响。这使宋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一